

公司人权义务的国际规制：内容、问题与发展  
—以《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为核心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Contents,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 to the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as the Core

劉萍·馮帥\*  
LIU Ping · FENG Shuai

目次

- I. 引言
- II. 人权与公司社会责任
- III. 《准则》中公司人权义务的主要内容
- IV. 《准则》中公司人权义务的规制阙
- V. 公司人权义务国际规制的未来发展
- VI. 结语

국문초록

국제법의 전통적 이론에 따라, 기업은 민간영역으로, 국내법에서만 감독을 받아야 하고 국제법과는 아무런 관련이 없지만 인권보호는 국제법을 포함하

논문접수일 : 2015. 03. 16.

심사완료일 : 2015. 04. 29.

게재확정일 : 2015. 04. 3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CSR国际造法活动及中国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8FX02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刘萍（1973-），女，四川成都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冯帅（1989-），男，安徽安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

는 국가적인 문제가 되어야 한다.

따라서, 기업과 인권 보호 사이에 교차지점이 존재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최근 수십년 동안, 일련의 인권 침해 문제는 기업에 의해 발생 되었으며, 따라서 인권 보호단체는 세계의 공동 노력을 요구하고 있다. 특히 경제의 세계화의 시대에서 인권문제는 더 민감하고, 어렵고 복잡하게 되었으며, 이는 국제법의 대상이 아니므로 기업은 더 이상 인권 보호의 책임을 피할 수 없다.

인권에 관한 다국적 기업 및 기타 비즈니스 기업의 책임에 대한 규범은 종합적이고 체계적으로 인권 보호, 인도주의, 국제 노동 보호, 환경 보호, 및 소비자의 권리 및 이익 보호와 관련된 기업의 인권 보호를 설명한 최초의 국제법적 문서이다. 범위의 규범적 보편성, 내용의 확산성 및 직접적 명령의 유효성 때문에, 이 문서는 인권위반에 대한 기업의 책임에 대한 주목할 만한 기념비적 지침서 중 하나로 간주되었다.

그러나 “국제 기업”, “회사의 음모” 및 “활동과 영향력의 범위”의 규범의 모호한 표현과, 광범위한 규제의 반대, 기업의 인권 의무에 대한 자기규제의 미숙성, 법원 관할에 관한 모호성과 다른 절차적 문제 때문에, 그것은 유엔 인권 위원회에 제출되었을 때 최종 투표에서 부결 되었다. 비즈니스와 인권에 대한 기본원칙 : 유엔 “보호, 존중, 구제” 프레임 워크실행은 2011년에 통과 되었지만, 기업의 인권의 국제 규제 의 측면에서 규범의 중요성 때문에, 그것은 오랜 기간 동안 이론과 실제 연구에 큰 영향을 끼치고 있다.

기업의 사회적 책임의 국제 개발을 통해서 기업의 인권 의무에 대한 국제 규제가 국제기업의 범위를 명확히 하고 학계에서 제기한 ‘직접공범’, ‘간접공범’, ‘침묵공범’, 및 ‘기업공모’의 분류를 상담하고, 활동과 영향의 표현을 해석 하데 적용되는 모습을 보는 것은 그리 어렵지 않을 것이다. 반면, 기업의 인권 의무는 WTO를 간접적이고 부정적인 규정에서 직접적이고 적극적인 규정으로의 주요 플랫폼으로 간주할 것이고, 또한 원래 의무의 근간위에 법적구제장치를 마련하고, 인권을 국제적, 국가적 차원에서 보호할 것이다.

**주제어** : 주식회사, 인권, 기업의 인권, 규범, 유엔

## I. 引言

在商业发展史上，尽管公司与人权保障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不可否认，商业行为（或商业活动）和人权之间始终存在紧密联系，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用辩证法能够得到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认识，但是，仅靠哲学层面上的辩证法诠释并不能完全解决商业活动与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法律、道德途径保障和促进商业活动中的人权，成为科学社会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更加凸显。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商业活动中的人权问题逐渐超越国家边界，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与此同时，国际法律框架也将视野投向了这一领域。由于现代商业活动大多以公司为载体，因此，商业与人权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也即在法律视域下的公司人权义务。

## II. 人权与公司社会责任

自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始，保障人权一直是国际社会与各个国家的努力方向和行动指南。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更是加强和拓展了对这一领域的维护力度与保护范围，奠定了人权作为国际政治核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基础。《纲领》第5条规定：“……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障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it is the duty of States,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纲领》的宣布使得人权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同时为“人权保障限于国家义务”的传统观点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权已和安全与和平、发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当今时代的主题，三者缺一不可，<sup>1)</sup>对人权

的保障也已无法仅局限于国家政府层面，还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和倡导。

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公司是私行为体，仅受各国国内法的规制，与国际法无涉，当然更谈不上享受国际法权利，承担国际法义务了。<sup>2)</sup>然而，近些年来一些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动和工作进展似乎表明，这种理论和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一系列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sup>3)</sup>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国家责任的不足，而公司拥有的权力正在逐步凸显，几乎可以与国家相提并论。<sup>4)</sup>1976年，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发布《跨国公司行动指南》(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197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Tripartit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随着二战后公司与员工间矛盾的频发，全球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对人权的渴望也日益强烈，Muluneh Aynalem学者指出了这一现象后的本质：“跨国公司成长壮大至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引发其相应的责任问题。现有国内和国际规制体系并不能有效控制不断扩张的公司权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已经证明当前的人权框架不足以应对此种发展。”<sup>5)</sup>在这一背景下，公司的社会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跨国公司“生产守则”运动应运而生，并迅速席卷全球，2000

1) 郭曰君. 人权：当今时代主题及我国的应对[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19-20.

2) Peter Muchlinsk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dited by Doreen Mcbarnet, Aurora Voiculescu & Tom Campbell, The New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2-433.

3) 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造成的印度博帕尔惨案剥夺了众多人的生命，延续性地侵害并继续侵害数以万计的印度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跨世纪的环境污染和人权损害；在尼日利亚的壳牌公司造成的1,626,000加仑石油泄露事件对当地环境和居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并将继续对其产生威胁；在Doe v. Unocal案件中，美国石油公司打着其行动符合“改善当地人生活”之幌子，在与缅甸政府合作建设“Yadana”天然气管道项目时，实施强奸妇女、强迫劳动、酷刑折磨、任意逮捕以及其他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犯人权的行爲等。参见：吴琼. 监管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的新突破——美国《外国人侵权法》介评[J]. 比较法研究, 2009, (5): 102; John C A.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ike Out, Journal of Labor & Employment Law, Winter 2000, p.2

4) Steven R. Rather,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 Theor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1, pp. 461-462.

5) Muluneh Aynalem,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Corporations: Voluntary Norms, Legal Obligations,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10, p4.

年，联合国确立了包含工商企业行为十项原则的《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然而，对公司人权义务首次进行系统规制的代表性文件当属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于2003年8月13日通过决议并批准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以下简称《准则》）。<sup>6)</sup>《准则》的确立对人权保障进行了深化和延展，是对跨国公司不断“冷漠”增长下的国际忧虑，也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权威解释，被称为“最全面和最权威的公司准则”，<sup>7)</sup>尤其在对公司负有人权义务的规定上更是迈出了一大步，是首次直接将强制性的人权责任赋予各种商业实体身上的尝试性探索。自此，公司与人权由传统的“互不相干”逐步走向“影不离灯”。联合国2007年的报告也指出，公司能够通过其作为或不作为来影响各类人权，且这种对人权的影响发生于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正如Rachel J. Anderso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本身的财富可能会超过其所在东道国的财富，而这种财富赋予了跨国公司影响投资母国和东道国国内个人、群体人权的力量。”<sup>8)</sup>由此可见，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将社会责任加诸于公司身上有“免费搭车者”之嫌，<sup>9)</sup>但国际社会将人权和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之间联系起来还是有其充分的事实和理论依据的。

6) 《准则》的制定历经了四年方得以完成。1998/8号决议决定于1999年8月3日设立一个负责审查跨国公司的工作方法和活动的会期工作组。在该工作组的努力下，拟定的准则草案和评注在政府、商业团体和工会等的磋商后才由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See Weissbrod D.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pp. 901-922.

7) Amnesty International Press State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elcome the New U.N. Norms on Transnational Business, Aug. 13, 2003, <http://web.amnesty.org/pages/ec-unnorms-eng>; Human Rights Watch, U. N. : New Standards for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Aug. 13, 2003, <http://www.hrw.org/press/2003/08/un081303.htm>.

8) Rachel J. Anderson. Reimagining Human Rights Law: Toward Global Regulation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88, No.1 (2010), p.205.

9) Ray Vern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 Harvard Law School Human Rights Program, 1999, p. 49.

### Ⅲ. 《准则》中公司人权义务的主要内容

尽管随着公司优势和权力的日益显现，公司应承担适当的人权责任也渐渐被人们所提及，然而公司人权义务的内容是需要深思的，因为不论怎样，公司都不会承担与国家等同的人权责任。一些国家责任对于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实体来说不具有执行的可能性，如庇护权、参加政府权、正当程序权等。《准则》在充分考虑国家与公司之间差异、定义跨国公司与其他商业实体概念，并参考《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对公司的伦理责任，尤其是人权责任作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

基本人权义务的遵守可以说是公司伦理实践的核心，而《准则》的确立是基本人权义务遵守的行为指南。《准则》由序言和九部分23个条文组成，它对跨国公司活动所涉及到的各方面原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论述，具体包括平等机会和非歧视待遇权（第2条）、人身安全权（第3-4条）、工人的权利（第5-9条）、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权（第10-12条）、保护消费者的义务（第13条）、保护环境的义务（第14条）和执行总则（第15-18条）等，<sup>10)</sup>所涉范围涵盖人权保护、人道主义、国际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同时，《准则》列举了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所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国际法渊源，<sup>11)</sup>并明确指出，尽管“国家负有增进、保证实现、尊重、确保尊重和保护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认的人权的首要责任” (States have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to respect, ensure respect for, prevent abuses of,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recognised in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national law)，但是“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其各自的活动和影响范围内，有义务增进、保证实现、尊重、确保尊重和保护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认的人权，包括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pheres of activity and influenc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ensure respect for, prevent abuses of,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in international

10) See Commentary on the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E/CN.4/Sub.2/2003/38.

11)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J]. 法学评论, 2012, (1): 104.

as well as national law)。这项条款将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作为人权遵守和保障的主要管理者，是对国家人权保障义务的补充。<sup>12)</sup>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权委员会渴望将人权义务适用于所有商业企业而不仅仅是跨国公司的愿望，从而避免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就基本人权标准的遵守上作不公正的区分。

从《准则》规制的客体来看，其至少涵盖了五个不同领域的权利保护，第一，它覆盖了传统的民事、政治人权问题，包括平等机会和非歧视待遇权、人身安全权和职工协商权，此外，诸如保密权、教育权、思想自由、信仰和宗教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等传统性权利也被涵盖其中；第二，它覆盖了主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款，包括安全、健康工作环境、工人赔偿、集体谈判权、尊重所在国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尊重健康权等；第三，它覆盖了新起的“第三代人权”，即促进、尊敬和保护无知的人与其他自愿团体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它覆盖了用来处理实现上述所有权利特殊问题的举措，即公司安全安排操作，它要求公司遵守国际人权标准、法律和所在国的职业标准；第五，它覆盖了超出人权义务的其他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和禁止贿赂等。除此之外，《准则》还设专章对跨国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实施机制进行了规定，机制包括定期汇报和披露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监督和核查，对受到企业活动不利影响的个人、团体和社区进行赔偿，通过签订合同促使供应商、分销商尊重和保护人权等。

《准则》在对公司人权义务进行规制上至少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领域上的普遍性。《准则》在标题上就将规制的对象定义为“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将所有商业实体均囊括其中，规制的对象范围较为宽广。第二，内容上的广泛性。《准则》阐述了公司对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负有的义务，且平等机会权、非歧视待遇权、人身安全权、工人权利和土著居民特殊权利的明确将公司人权义务的内容覆盖面拓展到了相当领域，所涉内容十分广泛。第三，效力上的直接性和强制性。《准则》一直试图在国际法层面，为包括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具体、直接、强制的人权义务。《准则》在第18条规定：“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

12) Surya Deva, UN's Human Rights Norms F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an Imperfect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004, pp. 493-509.

应对由于未能遵从这些准则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个人、实体和社区提供立即、有效和适当的赔偿，办法除其他外包括对造成的任何损失和夺走的财产给予赔偿、复原、补偿和恢复。在确定损失方面、在刑事处罚和所有其他方面，应根据国家法和国际法由国家法院和/或国际法庭执行本准则。”(Nothing in these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construed as diminishing, restricting, or adversely aff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States und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Nor shall they be construed as diminishing, or adversely affecting more protective human rights norms) 通过这一方法，

《准则》设想一个有约束力的机制，集中于国家法院和/或国际法庭，对因违反文件而受到影响的个人或组织提供直接、有效的赔偿权。

对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sup>13)</sup>国际社会也在一系列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将一部分社会责任加诸于公司身上，如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1974年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National Economics)<sup>14)</sup>以及1981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母乳代用品销售的国际守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等。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文件都只是站在全局角度来考察公司的整体社会责任，包括环境保护责任、劳工权益保护责任等，并未将公司的人权义务进行系统论证，而《准则》的提出弥补了公司社会责任的这一漏洞，因此备受关注，一直被认为是公司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sup>15)</sup>其主要内容较以往涉及公司人权义务的文件更具完整性、逻辑性和体系性。

13) 公司社会责任的萌芽源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但对其的集中讨论源自20世纪欧利文·谢尔顿的研究以及伯利与多德之间的论战，按集中讨论的时间起算，近一个世纪。

14)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J]. 东岳论丛, 2011, (1): 188.

15)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n the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901, p. 905.

## IV. 《准则》中公司人权义务的规制阙如

当然，由于法律的天然滞后性，以及《准则》并无完整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可供借鉴，因此，在现阶段，《准则》还存在一些问题，以至于该文件在最终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决时未获得通过。

### 1. 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关于“跨国公司”的界定，《准则》的论述是相当模糊的，它认为跨国公司“指在不止一个国家中经营的一个经济实体或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的一群经济实体——不论其法律形式如何，不论是在其本国还是活动所在国，也不论是单独经营还是集体经营”（The term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refers to an economic entity operating in more than one country or a cluster of economic entities operating in two or more countries - whatever their legal form, whether in their home country or country of activity, and whether taken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与其他定义不同，《准则》未将控制、影响行为的一致性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来决定一个实体是否是跨国公司。按照《准则》的论述情况来看，这个因素需要从经济实体的参考中去判断，它的缺少将会降低该文件对任何类型的跨国商业关系的可适用性。

但是应当注意，《准则》同时规定：“其他工商企业包括任何工商实体，不论其活动的性质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因此包括跨国公司、承包人、分包者、供应商、特许经营人或经销商；而且不论用以建立企业实体的是公司、伙伴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形式，也不论实体所有权的性质”（The phrase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 includes any business entity, regardl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nature of its activities, including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corporate, partnership, or other legal form used to establish the business ent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entity），试图用“其他工商企业”一词将“跨国公司”纳入其中，以弥补“跨国公司”在定义上的缺陷，然而，这一规定也是存在

问题的，因为《准则》在名称上使用“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即表明在该文件中“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此种处理方式不免与《准则》的制定初衷存在一定冲突。

此外，《准则》在“一般义务”的评述中对“公司同谋”（complicity）进行了论述，<sup>16)</sup>但却未对“公司同谋”下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有学者将其划分为“直接同谋”、“间接同谋”和“保持沉默的同谋”，<sup>17)</sup>但这种区分仍未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除此之外，《准则》在描述公司人权义务时将责任承担限定于公司“活动和影响的范围”，但对于范围所包含的具体领域和行为，《准则》同样保持了沉默，这也就导致了相关机构在对公司人权义务的认定上陷入技术性困境。

## 2. 公司人权义务的针对性不强

尽管相对于以往的国际法律文件来说，《准则》比较完整的将公司社会责任与人权结合了起来，但是它的一些实体性条款却还是超出了基本人权的议题，如第13条“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根据公平交易、营销和广告惯例行事，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安全与质量，包括遵守预防原则。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不得生产、销售、推销或广告宣传对用户有害或可能有害的产品”（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sha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fair business,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practices and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ey provide. Nor shall they produce, distribute, market, or

16) 《准则》第一条的评述规定：“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有义务适当地勤勉尽责，确保其活动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从它们已经意识到或应该意识到的侵犯人权行为中谋利。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进一步避免从事可能破坏法制和损害政府及其它方面增进和确保尊重人权努力的活动，并应利用它们的影响力以帮助增进和确保对人权的尊重。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了解其主要活动和拟议中的重要活动对人权的影响，以便它们能够进一步避免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同谋。”

17) Andrew Clapham and Scott Jerbi, Categories of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Human Rights Abuses, *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2001, pp. 339-349.

advertise potentially harmful or harmful products for use by consumers) 更像普遍的公司社会责任守则，反映出《准则》草案的形成是由一系列普遍商业伦理条款组成的事实，与此类似的还有《准则》第11条的禁止贿赂义务和第14条的环境保护义务等，这些实质性条款义务更多的是处理社会问题，而非通常描述的人权问题。

此外，从《准则》第23条也可看出，其所述之“人权”包括所有人权条约中规定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国际难民法、国际劳工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所有文书中规定的权利。可见，“人权”在《准则》中的范围十分广泛，针对性不强。因此，有学者认为，将这些条款作为国内法或国际公约下的规则事项比放在一个以人权义务为导向的国际法律文件中更为合适。<sup>18)</sup>

### 3. 公司人权义务的执行力度软弱

《准则》在公司人权义务之外还创设了责任追究和承担的指导原则。根据承担的主体不同，在“执行总则” (General Provisions of Implementation) 部分，《准则》规定了两种责任承担模式——“直接责任”承担和“间接责任”承担，前者直接由跨国公司来承担责任，而后者则由国家而非跨国公司来承担相关责任。在“直接责任”承担模式中，《准则》分别采取了“内部战略”和“外部战略”两种形式，其中，“内部战略”对公司经理、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和经销商等直接规定，通过发展公司文化来实现人权保护的目， “外部战略”通过外部机构的“定期监督和核查” (periodic monitoring) 来保护人权，同时赋予这种监督和核查的透明、独立的属性；在“间接责任”承担模式中，《准则》要求国家通过确立并加强必要的法律框架来确保公司人权义务的顺利履行。

一般来说，执行机制需要起到两方面的效用，一是预先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18) Peter Muchlinsk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dited by Doreen Mcbarnet, Aurora Voiculescu & Tom Campbell, *The New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47.

二是在出现违法状况时对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然而，在“直接责任”承担模式中，《准则》未能对监督执行的具体机制予以明确，仅通过附加的国家报告来监督《准则》的执行，显然不够充分也无法发挥效力。<sup>19)</sup>同样地，在“间接责任”承担模式中，《准则》使用了全文唯一的“应当”(shall)一词，表明其对国家的立法行为仅是一种“期待”，由于规定不够具体，因此国际法庭或国家法院使用这一规则时将会产生较大歧义。

有学者认为，与环境等领域相比，公司人权义务的“自我规制”尚未充分发展。<sup>20)</sup>一些商业界人士也表示公司承担人权责任是一个政治性命题，首先需要将公司变成“准政府间组织”，<sup>21)</sup>而这一过程将十分漫长。因此，相对于环境保护、健康、安全等事项来说，人权很少在“自我规制”中被确保，但另一方面，一些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某些鲁莽行为导致了人权损害，从本公司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些人文关切。因此，在对公司人权义务的执行上仅仅依靠《准则》是不足以实现其预期目的的，还需要适时转向国内法律管理层面。

#### 4. 法院的管辖权限不明

在“执行总则”部分，《准则》对不执行条文内容的跨国公司设立了赔偿机制——“立即、有效和充分的赔偿”(prompt, effective, and adequate reparation)。然而，在对公司人权义务诉诸法院的情形下，应当如何识别管辖法院，《准则》是沉默的，导致在普通法下“不方便法院”原则(doctrine of forum non-convenience)的继续适用，因此可能出现公司挑战当事人选择法院的适当性来赢取程序性利益。

19) Halina Ward. Secur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Through National Court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Options, *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2001, pp. 451-452.

20) Peter Muchlinsk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dited by Doreen Mcbarnet, Aurora Voiculescu & Tom Campbell, *The New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48.

21) Frans- Paul van der Putten, Gemma Crijns and Harry Hummels. *The Ability of Corporations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ory Sullivan(ed.),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heffield: Greenleaf Publishing, 2003, p. 82.

或者通过取消案件去往另一个对其更加同情的法院。事实上，这一程序性问题的存在恰恰是对跨国公司的保护而非受害者。<sup>22)</sup>

因而，《准则》需要建立某种基本的管辖规则，来确保这些“法律技巧”不损及当事人的合法请求。此外，由于欠缺形式性要件，即国家间意见的高度一致，因此《准则》创造的更有可能是一个“软法”义务，当然这并不是说《准则》完全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是《准则》的很多条款都带有“建议”性质，是一种非自愿性的行为指导，<sup>23)</sup>如在监督、执行上，《准则》采取的是“间接规制”途径，它并不具有违反义务的“硬性”惩罚机制，因此受害者往往难以依据《准则》来追究公司的法律责任或维护自身的人权。<sup>24)</sup>

综上所述，《准则》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人权保障的实施具有一些其它文件不可比拟的进步意义，但它是对以往文件的一个创新，并无现成的国际法律文件可供借鉴，因此其本身尚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以待完善。

## V. 公司人权义务国际规制的未来发展

《准则》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未来公司人权义务的国际规制仍将以《准则》为基础，并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完善，从而达到对公司人权义务进行合法、合理、有效规制的目的。

### 1. 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术语的涵义

如上所述，《准则》对“跨国公司”的定义另辟蹊径，导致对跨国公司理解的模糊性的产生。在对“公司同谋”和“活动和影响的范围”等的描述上，《准则》所作出的努力亦显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法律术语予以正确界定。

22) See *Connelly v. RTZ Corp. Plc*, 4 All E.R. 335 (House of Lords 1997); *Lubbe v. Cape, plc*, 1. W.L.R. 1545 (House of Lords 2002).

23) 赵岚音, 陈雷. 跨国公司人权义务的理论证成与实证考察[J]. 商业时代, 2012, (12): 102.

24) 李春林.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J]. 云南社会科学, 2012, (4): 121.

首先, 尽管《准则》试图覆盖各种商业实体, 但“跨国公司”的论述无疑是其中的一个瑕疵。《准则》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涵盖较窄, 它希望通过“其他工商企业”来弥补其中的规制漏洞, 而“工商企业”也确实将其囊括在内, 但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 《准则》将会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以换取全球范围内《准则》的被认可。其次, “公司同谋”首次出现于2009年人权观察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安然公司: 在侵犯人权中的公司同谋”中, 随后被《全球契约》的第二项原则所继承,<sup>25)</sup>但在国际人权领域, “公司同谋”始终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sup>26)</sup>照目前的情形来看, 学界对“公司同谋”的三分法——“直接同谋”、“间接同谋”和“保持沉默的同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直接同谋”指明他人正在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公司却予以协助; 间接同谋, 也称为“从人权侵犯中获益的同谋”(beneficial corporate complicity), 是指明知他人正在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公司却从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 并继续维持其伙伴关系; 保持沉默的同谋指在面对侵犯人权事件时, 公司的沉默和不作为态度。<sup>27)</sup>这种划分方法参照了刑法学上的“同谋”的概念, 对公司的人权责任赋予了较高标准, 尤其是“保持沉默的同谋”更是对公司人权责任的一项突破。根据该分类方法, 公司无法再忽视其经营活动所在地的人权侵犯事件的发生, 而是必须拥有更多的敏感性, 积极投身于人权保护当中。最后, 鉴于跨国公司侵犯人权事件的大量发生, “活动和影响的范围”应做扩大化解释, 不应局限于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 而是包括所有一切社会活动, 地点也不仅仅限于“当地”, 而囊括人权侵犯的行为发生地。

相关概念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前提, 也是法律正确发挥效用的生命力。因此,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公司人权义务的国际规制将吸取《准则》在此方面的教训,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术语的涵义。

25) 《全球契约》的第二项人权原则要求“企业应当确保其不成为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行为的同谋”(Make sure that they are not complicit in human rights abuses)。

26)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J], 法学评论, 2012, (1): 103.

27) Andrew Clapham and Scott Jerbi, Categories of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Human Rights Abuses, *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2001, pp. 339-349; Anthony P. Ewing,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Compact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in *Embedding Human Rights in Business Practice*, A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Office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New York: UN Global Compact Office, 2004, p. 40.

## 2. 以WTO为平台重构公司人权义务

WTO规则犹如一张巨大的网，任何国家均被笼罩其中，<sup>28)</sup>公司的贸易活动也不例外。WTO从规则制定，到争端解决，再到裁决实施，均体现出高效性、强制性和优越性等特征。<sup>29)</sup>但WTO历来对跨国公司较为优待，为其创设了较多权利，却很少规定义务，这也就是跨国公司能够迅速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准则》的条文多具“建议”性质，并无“硬性”举措，将其纳入WTO框架之下便能改变这一现状。事实上，WTO也应当将公司的人权义务纳入其规制射程，人权争端尽管不会涉及大量的贸易因素，但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等的设立将可为《准则》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而且WTO的宗旨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等，这些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对人权的尊重。

当然，将《准则》纳入WTO框架体系离不开WTO与联合国关系的进一步建立，联合国《准则》在规制公司人权义务问题上力不从心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缺乏有效的实施和监督机制，如何将《准则》纳入WTO体系还需要联合国与WTO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交流，如有学者建议分别在WTO体制下和联合国框架内设立“与贸易有关的人权理事会”和“人权与贸易委员会”，<sup>30)</sup>这一观点值得考虑。

## 3. 从间接规制、消极义务规制转向直接规制和积极义务规制

受传统国际法理论影响，公司作为人权保护的主体并未获得广泛认可，目前存在的大多数观点均认为人权诉求仅仅在政府把它们转变为国内法律规范范围内才具有规定性，其实也就是持国家需要确保公司遵守人权原则并保护公民不受公司不当行为侵犯的观点，结果，公司的人权义务充其量只是间接的。<sup>31)</sup>但由于人权

28) 张瑞萍，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J]，现代法学，2005，(3)：168。

29) Lucy Kronfors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Focus on Colombia,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5, pp. 343-344.

30) 宋永新，夏桂英，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01-102。

31) Florian Wettstie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Global Justic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a Quasi-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5.

并非纯粹的法律权利，它更多的是体现一种道德权利，且国际社会对人权进行规制的目的在于使强大的机构为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负责，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间接规制来保障人权不具高效性。

《准则》也好，公司普遍社会责任的国际文件也罢，国际社会强调的焦点均着眼于要求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侵犯人权，而非对其促进人权保护能力方面进行规定，可见，公司承担人权义务几乎都是消极性的，即不侵犯人权。然而，仅仅以消极义务规制而非公司行为目的来规定公司的人权义务，并不能很好的实现公司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也无法实现国内正义和全球正义。<sup>32)</sup>

国际社会也已经对公司人权义务的规制方式给予了高度关注，Koen De Feyter就曾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是国家负有人权保护的义务是不够的，还需要创建一些机制来确保其他行为体也参与尊重人权中来，这其中就包括了其活动使得人们陷入贫穷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实体。”他同时赞成公司应对人权保障承担直接的、积极的义务。<sup>33)</sup>David Kinley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必须被要求积极提供实现人权的手段，并促进第三方遵守和提供人权保障。”<sup>34)</sup>

#### 4. 义务设定与法律救济同向发展，国际规制与国内立法共同作用

正是由于公司人权义务的设定重在倚仗于对公司的间接规制，《准则》也并未为其设定直接、确定的人权义务，因此，也就不太可能据此确立完整的法律救济机制。尽管《准则》对“监督”、“核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且确立了“赔偿”机制，但其侧重点仍然在于对公司人权义务的设定上，法律救济措施和途径只是被“一带而过”，并无具体的救济行为可供遵循，救济机制的部分缺失将会大大增加权利人维权过程中的困难度。

32) 李春林,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J]. 云南社会科学, 2012, (4): 123.

33) Koen De Feyter,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the Market, Zed Books, 2005, p. 2.

34) David Kinley, Junko Tadaki, From Talk to Walk: The Emergence of Human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for Corporations at International Law,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4, No.2 (2004), p. 966.

目前，公司人权义务的承担存在两种极端可能性。有些国家由于国内法制体系本身特点，并未对公司的人权义务进行国内立法规制，它们遵守人权保障义务完全是基于国际法律文件的倡议和要求，但当侵犯人权案件发生时，国际文件的效用往往“鞭长莫及”，无法充分的发挥其效用。另有一些国家企图利用本国经济优势制定相应地国内法律法规，以此来规避尚未形成国际习惯的国际文件在本国的实施，甚至拒绝一些国际文件的通过。这些问题都将是公司人权义务国际规制未来应考虑的方向。此外，在将国际法文件的相关内容内化为国内立法时，需要同时考虑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的管辖权。东道国的管辖较好理解，可基于属地管辖原则予以管辖，而母国的管辖可能使跨国公司逃避相应的制裁，但不可否认，在许多情形下，母国管辖也不失为一种灵活选择。<sup>35)</sup>事实上，母国通过制定法律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规制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已有所体现。<sup>36)</sup>

尽管在《准则》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于2011年通过了《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但鉴于《准则》在公司人权义务国际规制方面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现有的《准则》框架仍将继续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准则》在条文规定上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其未来将会致力于对相关法律术语、文件规制效力、国际国内法律协同等方面进行完善。

## VI. 结语

尽管国内法，如美国1962年《人力开发与培训法》(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1964年《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和1973

35) Beth Stephens, *The Amoralty of Profi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pp. 59-61.

36) 如美国的Doe I v. Unocal Corp.案和Wiwa v. Royal Dutch Petroleum Company案，加拿大的奥美矿山矿渣倾泻案等。

年《全面就业与培训法》(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 以及英国1968年《伦敦城收购与兼并守则》(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和2006年新《公司法》(Company Act) 等都对公司的人权义务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论述, 但国内法律在规制公司行为——尤其是跨国公司的行为时并不能总是很好的发挥其效用, 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部分国家的国内法制体系尚不健全; 第二, 部分国家内部主观上并非十分积极; 第三, 国内法制体系存在制度性困境, 如适用效力的限制等。这些问题使得单单依靠国内法律来对公司的人权义务进行规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保障人权需要全球的努力, 并非一个或几个国家就能做好,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人权问题变得更为敏感、艰难和复杂, 公司再也无法以其不是国际法主体为由来逃避其应承担的人权责任。保障人权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项内容在《准则》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是对传统公司社会责任国际法律文件的突破和创新, 它的形成不仅标志着国际人权法领域的第一次(针对主权国家)革命近乎完成, 而且还开启了第二次(针对公司)革命的序幕。<sup>37)</sup>但是《准则》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缺陷使得它尚未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和接受, 然而公司只有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才能实现其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鉴于此, 联合国、政府间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应当通力合作, 继续完善、深化和推进《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义务标准, 争取尽早在国际法框架中获得各国的一致认可, 使其服务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 参考文献

- 郭曰君. 人权: 当今时代主题及我国的应对[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 Muluneh Aynalem.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Corporations: Voluntary Norms, Legal Obligations. VDM Verlag Dr. Müller, 2010.

37) 李春林.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J]. 云南社会科学, 2012, (4): 123.

-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J]. 法学评论, 2012, (1).
-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J]. 东岳论丛, 2011, (1).
- 赵岚音, 陈雷. 跨国公司人权义务的理论证成与实证考察[J]. 商业时代, 2012, (12).
- 李春林.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J]. 云南社会科学, 2012, (4).
- 迟德强. 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J]. 法学评论, 2012, (1).
- 宋永新, 夏桂英.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6).
- 张瑞萍. WTO规则下跨国公司行为规制方式分析[J]. 现代法学, 2005, (3).
- Beth Stephens. The Amoralism of Profi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 Koen De Feyter.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the Market*. Zed Books, 2005.
- Ray Vern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 Harvard Law School Human Rights Program, 1999.
- Surya Deva. UN's Human Rights Norms F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an Imperfect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004.
- Halina Ward. *Secur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Through National Court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Options*, *Hastings Int'l & Comp. L. Rev.* 2001.
- Lucy Kronfors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Focus on Colombia*.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05.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of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Contents,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o the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as the Core

LIU Ping

*Ph. D., Professor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FENG Shuai

*Ph. D. Course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corporation was private actor, which should be only regulated by domestic law,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hould be the issue of the country, involv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refore, there exists no intersection between corporation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owever, in recent decades, a serie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corporations, and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calls fo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has been more sensitive, difficult and complex, and corporation can no longer escape the responsibility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s it is not the subjec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 Norm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w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legal document tha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involve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umanitarian, international labor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Because of the Norms' universality of the scope, prevalence of the content, and the directness and mandatory of the validity, it wa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notable landmarks on the road of the corporation's responsibility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 But due to the Norms' vague expr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company conspiracy", and "scope of the activity and influence", and wide regulating object, undeveloped self-regul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 ambiguous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and other procedural matters, etc. it was failed to pass in the final vote when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has been passed in 2011, but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orms in th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it would continue having great effect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within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will apply itself to further clarify the scop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sul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rect accomplice", "indirect accomplice" and "silent accomplice" of the "company conspiracy" that suggested by the academic field, and interpret the expression of the "scope of the activity and influence". Meanwhile, the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will regar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s a main platform from indirect, negative regulation to direct and active regulation, set legal remedies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obligations, and protect the human rights 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s.

**Key words** : Corporation, Human rights, Corporation's human rights, Norms,  
UN